

历史学方法论

JI WENKU.

[波]耶日·托波尔斯基 著

张家哲 王寅 尤天然 译 尤天然 校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791571

书号 Ko
To2

4

导 言

没有一门学科比历史的写作受到更多的赞扬或遭受更多的批评了。西塞罗宣扬历史学教导人们如何去生活。亚里士多德则拒绝称它为真正的科学，而把诗学推崇为更高智慧。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里，历史学在科学的等级中或被推上君临一切的地位，或被降至一个卑微的角色。今天，人们可以羡慕历史学家们所使用的方法的与日俱增的精确性和复杂性；然而另一方面，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依然被视为是如何重现历史的过去的理想典型。就是那些否认历史可以客观地再现的人们也希望自己被历史学家们“客观地”或“不客观地”记载下来。不喜欢历史和害怕历史的判决与对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们——历史学家的尊敬与敬畏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因此，人们对于历史学的态度是双重性的。

关于历史学的争论仍在继续。大不相同的争论问题也都尚未解决。然而历史学家们自己却很少卷入这场论争。一个历史学家很少会决意打开自己的书房之门，去参加关于历史学的意义的混战。他更多的是使劲关紧房门，回到书房，而不顾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科学研究与他的读者之间的隔阂可能会扩大。但历史学家并没有回避战斗，他只是在选择自己的战场。他所要坚持的当然是历史的真实性和展现过去时的诚实性，并相信这才是他可为社会服务的最佳途径。正因为他专心致志于这一问题，他才把关于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争论留给了别人。尽管历史学家的日常工作作为争论的各方面都提供了论据，但争论的问题却都是在历史学家之外解决的。甚至当他决心加入这场论战，他也往往不会认识到由于

他使用的是一种特别的语言，他的加入受到了限制。历史学家应该改变他对有关历史学争论的态度吗？不，他不能卷入到一场两面作战的战斗中去；生命短暂，艺术永恒(ars longa, Vita brevis)。

那么从事实际研究的职业历史学家在这场关于历史学学科的争论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他既不能不重视这场争论，但也不能把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争论上面。不过，他可以表明自己在争论中的立场，然后通过自己的日常工作，举出实例说明之。用这种方式，他既能捍卫自己的立场，同时又能尽自己的职责，增大历史学赖以存在的知识实体。

现在正是从事实际研究的历史学家帮助作出有关历史编纂学争论的结论的时候。古老的科学等级结构信念现在正在土崩瓦解。人们不再认为有一种适用于所有科学研究而其他学科都必须从属于它的模式。只是上述信念的解体很缓慢，它的衰落是在19世纪初，随着证明甚至在数学那门学科中都存在着缺乏精确性、而直观思维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广阔领域而开始的。这一证明导致了对于数学方法的综合研究(参见D.希尔伯特)。就这样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其中包括哥德尔定理和对可能存在一种绝对精确的语言这种信念不过是一种幻想的其他论证。激进的物理学主义计划也破产了，那种建立一个以将一切学科所使用的术语都归结为物理学术语为基础的、统一科学的一度诱人的想法，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越来越坚信不存在理想的科学，并强调至少在现有发展水平上的每一学科的特点，这些都促进了对特定学科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经验主义研究。其结果便是：我们可以提倡科学的统一，要求科学语言精确化，并要求学者们应象对待一件精密仪器那样小心翼翼地对待科学语言，同时又抛弃任何关于明确的科学等级制的教条主义主张。

对研究科学方法的关注深深地影响了历史学。而历史学则一直是一门存在着争议的学科。近几十年来，处身于一个迅速变化着的世界中(参见 G. 巴勒克拉夫)，历史学家都忙于搞他们的实际研究(这离 A·法朗士的观点已愈来愈远了)，并已改进了自己的方法。他们的成果已迅速增加。用这类在方法上更为复杂的历史著作的日益增多的成果武装起来之后，今天的历史学家便能够怀着新的信心加入到关于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的本质和地位的争论中去。如果他无视最新的历史学方法和它们的成就，他就会遭到更有经验的、在方法上更为先进的社会科学家的带有优越感的嘲笑。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必需了解最新的方法，即使他们本人目前不在实践中使用它们。如果没有这种总体上的了解，历史学是不可能提高地位的。

过去的历史学家关于他们自己研究技能的陈述，显示了他们方法论意识的特性和水平。数十年前，当马克·布洛克写他的《历史学家的职业》，科学方法学还远不如当今发达时，历史学家们对一些明显的方法问题还很少注意。从那时以后，关于历史科学已说了很多，然而却没有历史学家的参与。今天，从事历史编纂工作的人们不得不更要认识到方法论的重要性了。

对历史学方法论的误解依然存在，这就使充分自觉地运用研究方法编写历史成为一项困难的任務。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是历史学方法论构建了一套能较为容易地解决复杂事例的安排好了的公式。只有在具体问题中才会出现方法问题；特殊的方法用于特殊的事例，而只有当它们直接“有助于”研究具体问题时才受到重视。因此，历史学家对研究方法的直接兴趣(如各种著作中所反映的)，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仅局限于 19 世纪所注目的问题范围之内，并被诸如史料考证之类的技术性问题所支配。

本书是从对历史科学的状况和威胁着这门科学的实际危险日

积月累的思考中产生的。历史学在19世纪开始抛弃启蒙主义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建构而转向19世纪的博学主义时，便已面临着危险，并遭到一门新兴学科——社会学的挑战。社会学家们在被历史学家忽视了的地方不断开发，虽然这些地方以前也曾被他们耕耘过（例如被伊本·赫勒敦、马基雅弗利、伏尔泰、弗格森和其他等人）。古老而又自负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历史学，发现自己的作用在理论表述的、实质上主要是结构的领域中已被社会学所削弱。这意味着历史学已丧失了作为解释历史发展之谜的两大必不可少的主要因素之一的地位。因为为了解释一个系统的发展（参见第九、第十章），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一系统在连续发展的瞬时中所经过的阶段（因为这仅说明了它的变化），而且还要了解它的结构。这也就是说在任何科学中，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都是必不可缺的。但对每一门科学分支来说，这两种研究方式之间的比重是不同的。可是在所有的科学中，观察和理论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观察（经验）是永远不可能与理论完全脱离的。

L·杰莫纳特的分析强调了科学理论的“开放性”。杰莫纳特正确地指出，如果没有历史的和实质上是实事求是的思考那是永远也不可能把握住科学的本质的^①。为了避免历史学所面临的危险，历史学家就必须更为自觉地对待方法论。这将帮助他去注视科学中正在进行着什么，看看花费的力气有多大。关键并不在于哪一门科学将统领其他的科学，而在于哪一门社会科学将对社会的研究提供一种整体的研究方式。是历史学？还是社会学？或是社会心理学？提倡构想一个学科等级制度的那种科学统一，已确实无疑地被提倡对所有的学科一视同仁、并寻找各学科之间可能的联系的那种科学一体化所代替。历史学必须在众多的科学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

本书可以被用于教授历史学方法论，但本书的初衷倒并不是

为此目的。它的意图是考察历史编纂学方法论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并评价已取得的主要成就。本书还根据历史科学的确切概念及其任务提出一项建议。用通常的语言来表述，这个建议的两个基本点是：

(1) 历史学研究的任务是解释——亦即描述系统发展的方式和原因。

(2) 在对系统发展进行有效的历史研究时是不可能把实际考察与理论思维分割开来的。历史学家越有研究普遍规律的自觉性，他的研究也将更会有成效。具有研究普遍规律的自觉性是历史学家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型的一种功能。当然，许多情况将依赖于那种知识的范围和质量。

这两种设想是对历史编纂学演变的各阶段进行了尽可能透彻的分析后得出的主要结论。第一个设想涉及到作为历史研究的内容的历史学；第二个设想涉及到历史学家们所运用的研究程序及用特定语言所表述的研究成果。

本书第一编论述了历史学方法论的范围以及这一术语的各种含义。这里假定历史学方法论可作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解释。前者仅包括“历史科学”的“专门技巧”，也就是一系列方法和一系列表述；后者则包括关于附加于历史研究内容的一般思考。本书倾向于第二种更为广义的概念。

第二编展示了关于历史学和历史著作的思考演变的主要轮廓。几种思考的类型可分为：实用的、批判的、博学——发生学的、结构的、逻辑的和辩证的。每一种类型都集中在历史研究的几个特定方面。逻辑的和辩证的类型与本书的内容相近。这里所说的辩证类型涉及了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而逻辑类型则通过对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和历史编纂学的方法论结构的描述，为一种元科学 (metascientific) 的分析提供了形式上的工具。承认观察与理论

不能分离,导致了非纯粹的资料源知识。这样一种概念的产生,而这对于严格尊重原始资料的传统史学家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概念。非资料源知识将在第三编中进行讨论,该编将主要评论历史研究的内容问题。在这一领域中所得出的结论,有时被称为历史哲学,我们认为它们是历史研究中所需要的非资料源知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本书的这一部分要探讨什么是历史“事实”问题。

第四和第五编论述再现历史进程的程序,在这个程序中,历史学家既要凭借资料源知识,又要凭借非资料源知识。这两部分中有历史资料理论分析,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探讨,确定历史事实的方法以及解释与综合问题。最后,第六编论及了对历史科学的方法论结构的分析,从而试图对关于历史科学的个案研究性这一古老的问题作出一种尝试性的回答。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一直不断地感到这一工作的艰难。当我与已故的A.马莱夫斯基合写《历史学方法论研究》(1960年,波兰文版)时,我的处境是无与伦比地良好。如果该书曾引起一些重视,如在C.兹纳米耶罗夫斯基、J.盖迪明、S.诺瓦克和L.诺瓦克等人的评论中所见到的那样,那主要应归功于马莱夫斯基,他在历史材料的方法论分析上显示出了特殊的技巧。我相信本书的一些地方是有缺点的,因为单独一个作者不可能令人满意地既具有方法论专家的能力同时又具有从事实际研究的历史学家的能力,即同时具备当前正在如此迅猛发展的这两门学科的能力。我已意识到自己

-
- 资料源知识 (Source-based knowledge) 和下文的非资料源知识 (Non-Source-based knowledge) 是作者自己创造的并在本书中经常使用的两个意义相关的术语。它们是指建立在(或不建立在),或者来源于(或非来源于)史料(或资料)的知识。为了使术语的译名简明清楚起见,我们把它们译为“资料源知识”和“非资料源知识”。如有不妥,欢迎指正。——译注

的能力也必然会日益落后于科学的最新进展。

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困难，我还是决定承担起写一个历史学方法论纲要的任务，因为我知道我可以依靠许多人的善意，他们在这项工作中始终在帮助着我。这对于更为精确地表达思想特别有帮助。J.盖迪明从本书第一个提纲起就对我提供的帮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不仅是指他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的创新研究（特别是关于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方法及历史分析的方法曾被我多次引用），而且也指他慷慨大方的个人忠告以及他为出版者写的本书评论。我还应感谢 T.扎瓦兹基，因为他和我讨论过本书的所有章节。他在再现古代历史学家们的方法论设想方面对我帮助特别大。同样，T.科扎内兹基和其他同事们提供了书籍并发表了评论。我还要感激波兰哲学协会波兹南分会，本书中所考虑的一些问题曾在那儿进行过讨论。我要特别感谢 G.拉布达教授和已故的 M.H.塞雷伊斯基教授，他们十分热情地阅读了本书手稿并不吝时间撰写评论。

虽然我提到了所有这些学者的善意，但我决不是在暗示他们对本书中所表达的意见要分担责任。所有的批评和异议读者都应向作者本人提出。最后一点应向读者说明的是：作者到底是一个历史学家，还是个方法论专家？我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一位力图把科学一体化的方案付诸实践的历史学家。如果说我极为冒昧地闯入了本属著名专家们的领域，那就把我要思考一下科学一体化的可能性的这一愿望作为我的借口吧。在我整个写作期间，我一直受到了 ch.朗格卢瓦和 ch.瑟诺博斯一本较早的著名著作中的一段话的激励：“实际上，历史学毫无疑问地是一门这样的学科，在这门学科中，特别需要从事实际研究者对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具有明确的意识。”^②

充分意识到这一实际情况将使历史研究更为接近一般群众，

也将把最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学科之一的历史学引导到有效地参与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去。

1966年9月于波兹南

注 释

- ① L.杰莫纳特：《哲学与科学哲学》，米兰，1960年意大利文版。
- ② ch.朗格卢瓦与ch.塞诺博斯：《历史研究法导论》，巴黎，1905年法文版。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编 方法论与历史学	(9)
第一章 科学方法论的内容	(9)
第二章 历史学方法论的内容	(29)
第三章 历史研究内容的范围	(44)
第二编 历史研究的模式分类的根据	(57)
第四章 实用型的思考	(66)
第五章 批判型的思考	(78)
第六章 博车型和发生学型的思考	(96)
第七章 结构型的思考	(124)
第八章 逻辑型的思考	(169)
第九章 辩证型的思考	(193)
第三编 客观的历史学方法论	(217)
第十章 历史事实	(217)
第十一章 历史的进程(因果论与决定论)	(238)
第十二章 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性)	(275)
第四编 实用性历史学方法论: 关于资料	
源知识和非资料来源知识的理论	(302)
第十三章 历史认识的本质	(302)
第十四章 疑问和回答历史研究的一般重现	(356)
第十五章 关于资料来源知识的理论	(382)

第十六章	关于非资料来源知识的理论·····	(397)
第十七章	资料来源知识和非资料来源知识的功能·····	(414)
第五编	实用性历史学方法论：重现历史	
	进程的方法 ·····	(425)
第十八章	原始资料的可信性与信息	
	提供者的可靠性·····	(425)
第十九章	确定历史事实的方法·····	(448)
第二十章	历史研究中的计量方法·····	(475)
第二十一章	历史研究中的解释程序·····	(525)
第二十二章	阐释与综合·····	(575)
第六编	非实用性历史学方法论 ·····	(590)
第二十三章	历史叙述的性质和手段·····	(590)
第二十四章	记叙的成分：历史的陈述与规律·····	(611)
第二十五章	历史记叙的要素：价值评述·····	(631)
第二十六章	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结构·····	(650)
译后记	·····	(668)
中外人名译名对照表	·····	(670)

第十六章	关于非资料来源知识的理论·····	(397)
第十七章	资料来源知识和非资料来源知识的功能·····	(414)
第五编	实用性历史学方法论：重现历史	
	进程的方法 ·····	(425)
第十八章	原始资料的可信性与信息	
	提供者的可靠性·····	(425)
第十九章	确定历史事实的方法·····	(448)
第二十章	历史研究中的计量方法·····	(475)
第二十一章	历史研究中的解释程序·····	(525)
第二十二章	阐释与综合·····	(575)
第六编	非实用性历史学方法论 ·····	(590)
第二十三章	历史叙述的性质和手段·····	(590)
第二十四章	记叙的成分：历史的陈述与规律·····	(611)
第二十五章	历史记叙的要素：价值评述·····	(631)
第二十六章	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结构·····	(650)
译后记	·····	(668)
中外人名译名对照表	·····	(670)

导 言

没有一门学科比历史的写作受到更多的赞扬或遭受更多的批评了。西塞罗宣扬历史学教导人们如何去生活。亚里士多德则拒绝称它为真正的科学，而把诗学推崇为更高智慧。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里，历史学在科学的等级中或被推上君临一切的地位，或被降至一个卑微的角色。今天，人们可以羡慕历史学家们所使用的方法的与日俱增的精确性和复杂性；然而另一方面，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依然被视为是如何重现历史的过去的理想典型。就是那些否认历史可以客观地再现的人们也希望自己被历史学家们“客观地”或“不客观地”记载下来。不喜欢历史和害怕历史的判决与对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们——历史学家的尊敬与敬畏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因此，人们对于历史学的态度是双重性的。

关于历史学的争论仍在继续。大不相同的争论问题也都尚未解决。然而历史学家们自己却很少卷入这场论争。一个历史学家很少会决意打开自己的书房之门，去参加关于历史学的意义的混战。他更多的是使劲关紧房门，回到书房，而不顾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科学研究与他的读者之间的隔阂可能会扩大。但历史学家并没有回避战斗，他只是在选择自己的战场。他所要坚持的当然是历史的真实性和展现过去时的诚实性，并相信这才是他可为社会服务的最佳途径。正因为他专心致志于这一问题，他才把关于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争论留给了别人。尽管历史学家的日常工作作为争论的各方面都提供了论据，但争论的问题却都是在历史学家之外解决的。甚至当他决心加入这场论战，他也往往不会认识到由于

他使用的是一种特别的语言，他的加入受到了限制。历史学家应该改变他对有关历史学争论的态度吗？不，他不能卷入到一场两面作战的战斗中去；生命短暂，艺术永恒(ars longa, Vita brevis)。

那么从事实际研究的职业历史学家在这场关于历史学学科的争论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他既不能不重视这场争论，但也不能把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争论上面。不过，他可以表明自己在争论中的立场，然后通过自己的日常工作，举出实例说明之。用这种方式，他既能捍卫自己的立场，同时又能尽自己的职责，增大历史学赖以存在的知识实体。

现在正是从事实际研究的历史学家帮助作出有关历史编纂学争论的结论的时候。古老的科学等级结构信念现在正在土崩瓦解。人们不再认为有一种适用于所有科学研究而其他学科都必须从属于它的模式。只是上述信念的解体很缓慢，它的衰落是在19世纪初，随着证明甚至在数学那门学科中都存在着缺乏精确性、而直观思维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广阔领域而开始的。这一证明导致了对于数学方法的综合研究(参见D.希尔伯特)。就这样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其中包括哥德尔定理和对可能存在一种绝对精确的语言这种信念不过是一种幻想的其他论证。激进的物理学主义计划也破产了，那种建立一个以将一切学科所使用的术语都归结为物理学术语为基础的、统一科学的一度诱人的想法，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越来越坚信不存在理想的科学，并强调至少在现有发展水平上的每一学科的特点，这些都促进了对特定学科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经验主义研究。其结果便是：我们可以提倡科学的统一，要求科学语言精确化，并要求学者们应象对待一件精密仪器那样小心翼翼地对待科学语言，同时又抛弃任何关于明确的科学等级制的教条主义主张。

对研究科学方法的关注深深地影响了历史学。而历史学则一直是一门存在着争议的学科。近几十年来，处身于一个迅速变化着的世界中(参见 G. 巴勒克拉夫)，历史学家都忙于搞他们的实际研究(这离 A·法朗士的观点已愈来愈远了)，并已改进了自己的方法。他们的成果已迅速增加。用这类在方法上更为复杂的历史著作的日益增多的成果武装起来之后，今天的历史学家便能够怀着新的信心加入到关于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的本质和地位的争论中去。如果他无视最新的历史学方法和它们的成就，他就会遭到更有经验的、在方法上更为先进的社会科学家的带有优越感的嘲笑。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必需了解最新的方法，即使他们本人目前不在实践中使用它们。如果没有这种总体上的了解，历史学是不可能提高地位的。

过去的历史学家关于他们自己研究技能的陈述，显示了他们方法论意识的特性和水平。数十年前，当马克·布洛克写他的《历史学家的职业》，科学方法学还远不如当今发达时，历史学家们对一些明显的方法问题还很少注意。从那时以后，关于历史科学已说了很多，然而却没有历史学家的参与。今天，从事历史编纂工作的人们不得不更要认识到方法论的重要性了。

对历史学方法论的误解依然存在，这就使充分自觉地运用研究方法编写历史成为一项困难的任務。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是历史学方法论构建了一套能较为容易地解决复杂事例的安排好了的公式。只有在具体问题中才会出现方法问题；特殊的方法用于特殊的事例，而只有当它们直接“有助于”研究具体问题时才受到重视。因此，历史学家对研究方法的直接兴趣(如各种著作中所反映的)，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仅局限于 19 世纪所注目的问题范围之内，并被诸如史料考证之类的技术性问题所支配。

本书是从对历史科学的状况和威胁着这门科学的实际危险日

积月累的思考中产生的。历史学在19世纪开始抛弃启蒙主义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建构而转向19世纪的博学主义时，便已面临着危险，并遭到一门新兴学科——社会学的挑战。社会学家们在被历史学家忽视了的地方不断开发，虽然这些地方以前也曾被他们耕耘过（例如被伊本·赫勒敦、马基雅弗利、伏尔泰、弗格森和其他等人）。古老而又自负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历史学，发现自己的作用在理论表述的、实质上主要是结构的领域中已被社会学所削弱。这意味着历史学已丧失了作为解释历史发展之谜的两大必不可少的主要因素之一的地位。因为为了解释一个系统的发展（参见第九、第十章），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一系统在连续发展的瞬时中所经过的阶段（因为这仅说明了它的变化），而且还要了解它的结构。这也就是说在任何科学中，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都是必不可缺的。但对每一门科学分支来说，这两种研究方式之间的比重是不同的。可是在所有的科学中，观察和理论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观察（经验）是永远不可能与理论完全脱离的。

L·杰莫纳特的分析强调了科学理论的“开放性”。杰莫纳特正确地指出，如果没有历史的和实质上是实事求是的思考那是永远也不可能把握住科学的本质的^①。为了避免历史学所面临的危险，历史学家就必须更为自觉地对待方法论。这将帮助他去注视科学中正在进行着什么，看看花费的力气有多大。关键并不在于哪一门科学将统领其他的科学，而在于哪一门社会科学将对社会的研究提供一种整体的研究方式。是历史学？还是社会学？或是社会心理学？提倡构想一个学科等级制度的那种科学统一，已确实无疑地被提倡对所有的学科一视同仁、并寻找各学科之间可能的联系的那种科学一体化所代替。历史学必须在众多的科学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

本书可以被用于教授历史学方法论；但本书的初衷倒并不是

为此目的。它的意图是考察历史编纂学方法论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并评价已取得的主要成就。本书还根据历史科学的确切概念及其任务提出一项建议。用通常的语言来表述，这个建议的两个基本点是：

(1) 历史学研究的任务是解释——亦即描述系统发展的方式和原因。

(2) 在对系统发展进行有效的历史研究时是不可能把实际考察与理论思维分割开来的。历史学家越有研究普遍规律的自觉性，他的研究也将更会有成效。具有研究普遍规律的自觉性是历史学家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型的一种功能。当然，许多情况将依赖于那种知识的范围和质量。

这两种设想是对历史编纂学演变的各阶段进行了尽可能透彻的分析后得出的主要结论。第一个设想涉及到作为历史研究的内容的历史学；第二个设想涉及到历史学家们所运用的研究程序及用特定语言所表述的研究成果。

本书第一编论述了历史学方法论的范围以及这一术语的各种含义。这里假定历史学方法论可作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解释。前者仅包括“历史科学”的“专门技巧”，也就是一系列方法和一系列表述；后者则包括关于附加于历史研究内容的一般思考。本书倾向于第二种更为广义的概念。

第二编展示了关于历史学和历史著作的思考演变的主要轮廓。几种思考的类型可分为：实用的、批判的、博学——发生学的、结构的、逻辑的和辩证的。每一种类型都集中在历史研究的几个特定方面。逻辑的和辩证的类型与本书的内容相近。这里所说的辩证类型涉及了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而逻辑类型则通过对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和历史编纂学的方法论结构的描述，为一种元科学（metascientific）的分析提供了形式上的工具。承认观察与理论